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三重逻辑

裴怡苒

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6日

摘要

“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本文从历史、理论、实践三重逻辑对这一命题进行系统阐释。历史逻辑表明,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从“生存需求与落后生产力”向“发展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转化, 二者关系经历了从“以物优先”到“以物量人”再到“物人协同”的矛盾运动过程, 该命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论。理论逻辑揭示, 唯物史观视域下, 投资于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建构, 投资于人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生成与发展, 二者在物质生产与人的发展、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实践逻辑提出, 推进二者的紧密结合,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以“投资于人”引领“投资于物”的方向, 以“投资于物”夯实“投资于人”的物质平台, 完善制度保障, 构建协同发展长效机制。三重逻辑环环相扣, 标志着发展范式从“物的逻辑”向“人的逻辑”的根本性跃迁, 是实现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投资于物, 投资于人, 三重逻辑

The Triple Logic of “Investing in Things” and “Investing in People” Closely Combined

Yiran Pei

College of Marxism,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ne 13, 2026; accepted: July 5, 2026; published: July 16, 2026

Abstract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investing in goods” and “investing in people” is a major strategic deployment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system-

atic explanation of this proposition through the triple logic of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Historical logic shows that as the main contradiction in society shifts from “survival needs and backward productive forces” to “development needs and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has gone through a process of contradictory movement from “prioritizing things” to “measuring people with things” and then to “coordinating things and people”. This proposition is an inevitable conclusion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logic reveal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vesting in things is the objectification construction of human essential power, investing in people is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essential power, and the two constitute an inseparable whole in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The practical logic proposes that to promote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we must adhere to a systematic concept, lead the direction of “investing in people” with “investing in things”, consolidate the material platform of “investing in people” with “investing in things”, improv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nd build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triple logic interlocking marks the fundamental transi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aradigm from “the logic of things” to “the logic of people”, and is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enrichment of things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people.

Keywords

Investment in Goods, Investing in People, Triple Logic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2025 年 12 月 11 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总结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和经验时，明确提出“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¹《2026 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再次强调“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²这一重大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当代经济社会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在投资建设领域和人口发展领域对新发展理念为进一步哲学深化，对我国未来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从学理上看，“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分别对应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两大范畴。当前，学术界对于“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这一命题展开了热烈且成果颇丰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经济学领域侧重于要素分析，重点关注二者的协同效应，单纯地将“物力资本”与“人”力视为并列的生产要素；在社会学领域侧重于资本结构，围绕这两类资本存量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转换逻辑进行重点分析；在哲学领域侧重于价值批判，对“人-物”的关系多停留于批判性分析，尚未能从跨学科多领域的视野出发对投资实践进行分析。基于此，鲜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域下系统地整体地探讨分析“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三重逻辑。本文从哲学维度立足于唯物史观，揭示二者关系随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演进规律，阐明二者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的辩证统一，从实践层面探讨其实现路径。三重逻辑层层递进，既是对既有研究的重要补充，为深入理解这一命题的丰富内涵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也是对破解“重物轻人”发展困境的实践回应，为应对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转型挑战提供系统性的实践行动路向。

¹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12/content_7050963.htm

²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0692.htm

2. 历史逻辑：“物”与“人”投资关系的矛盾运动

“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关系，本质上是社会主要矛盾在投资领域的具体反映。历史并非外在于人的纯粹自发运动，而是现实的人基于对象性活动塑造自身的历史自觉过程。随着社会主要矛盾从“生存需求与落后生产力”到“发展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转化，二者关系经历了从“以物优先”到“以物量人”再到“物人协同”的矛盾运动过程。这一演进逻辑，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命题提供了历史必然性依据和逻辑前提。

（一）社会生存需求矛盾“有没有”决定“以物优先”的投资关系

恩格斯曾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P1002} 当社会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基本生存需求与落后物质生产之间的对立时，优先投资于物是解决矛盾的主要手段。在这一矛盾阶段，物质资本极度匮乏，将有限资源集中投向物质生产领域，是满足人民基本生存需要的必然选择。“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处于“以物优先”的关系，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统购统销等措施，迅速建立起支撑社会运行的基础工业体系。而“投资于人”则从属于物质积累目标，主要体现为基础教育普及、公共卫生改善、提高劳动者的健康素质等服务于工业化劳动力需求的投入。

（二）发展需求矛盾“好不好”决定“以物量人”的投资关系

马克思科学区分了“自然需要”与“社会需要”的区别，随着生产力逐步提高，社会主要矛盾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体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单纯依靠物质扩张已无法满足人民日益丰富的发展需求，“自然需要”向“社会需要”的跃升，决定了投资于人的地位随之上升。在这一矛盾阶段，“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处于“以物量人”的关系，“投资于物”仍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但其路径却转变为协调发展和结构优化，人的价值被纳入经济核算，投资于人服务于更高的物质产出。虽然物质投入仍占优势，但国家工业结构变为农、轻、重协调发展。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创造了长达数十年的“人口红利”，恢复高考、义务教育、“科教兴国”战略，提升人口素质显著提高，社会保障体系从无到有。对“人”的投资被视为实现“物”的更高产出的手段。正是这种量化思维，使“投资于人”从边缘逐渐走向中心，为后续的战略升维奠定了基础。

（三）发展质量矛盾“优不优”决定“物人协同”的投资关系

进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核心不再是“有没有”或“好不好”，而是“平不平衡、充不充分、优不优质”。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需要”进一步升华为涵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在内的“美好生活需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关系进入“物人协同”阶段，二者不再是主从关系或量化关系，而是相互赋能的辩证统一。“投资于物”聚焦 5G、工业互联网、高精尖企业建设与集成电路、高端数控机床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智能化、绿色化的物质平台和创新性保障。“投资于人”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通过健康中国、教育现代化、育儿补贴等系统投入，将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目标而非手段，使人力资本成为驱动创新的核心动能。这种“物为人用、人驭于物”的协同格局，标志着投资实践从“自发”走向“自觉”，发展范式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为实现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3. 理论逻辑：唯物史观视域下二者结合的哲学依据

如果说历史逻辑回答了“从何而来”，那么理论逻辑则要回答“为何成立”。唯物史观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为理解“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辩证统一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武器。从唯物史观出发，二者之所以必须“紧密结合”，根植于物质生产与人的发展的内在关联，根植于生产

力要素中“物”与“人”的不可分割性，根植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一)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哲学本质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投资于物”绝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固定资产积累，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建构。投资于物的哲学内涵在于，它是人类通过资本投入，持续完善实践活动物质载体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2], p. 170)这意味着，对劳动资料的投资，本质上是对人的实践能力的物质确证，每一次对“物”的投资飞跃，都是人的本质力量向外部世界的对象化投射。物质资本承载了人的实践意图和能力延伸，投资于物的价值，在于它能否更好地服务于人的需要、拓展人的实践边界。离开了这一价值指向，投资于物就会退化为冰冷的物质堆砌，甚至走向“物的增值与人的贬值成正比”的异化道路。

投资于人的哲学内涵在于人的本质力量的生成与解放，呈现出价值理性、精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它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圭臬，而是以人的发展与完善为宗旨。它的对象是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健康素养，构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内在条件；它还具有超越物质资本有限性的特征，人的能力可以持续生成、迭代和代际传承。马克思将人的“类特性”归结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能够在实践中能动地“创造对象世界”([3], p. 162)。人通过实践不断创造对象世界，同时也在创造和提升自身。投资于人对教育、培训、健康、文化等领域的持续投入，正是对人之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与培育。它不仅使人获得谋生的技能，更要使人获得全面发展的能力。马克思憧憬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正是投资于人的终极指向。在这个意义上，投资于人不是经济增长的“工具”，而是社会发展的“目的”本身。

(二) 二者辩证统一的唯物史观依据

第一，物质生产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前提。人类历史活动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客观的物质生产实践，马克思这样说道：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物质生产本身”([3], p. 531)“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 p. 591)投资于物为投资于人提供了物质载体，没有物质资料的充分生产，对人的任何投资都会成为无源之水，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了“物”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人是激活物质资本的核心动能。唯物史观同时强调，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最具革命性的因素是人。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生产力是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人是广大劳动群众。”物质资本是过去劳动凝结而成的“死劳动”，只有通过人的“活劳动”才能被激活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投资于人所培育的知识、技能和创造力，决定了物质资本能否实现其应有效能，持续迭代升级。

第三，二者在历史进程中辩证转化。依据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不同阶段发生转换。工业化初期，物质资本极度匮乏，投资于物成为矛盾主要方面，投资于人从属于物；工业化中后期，物质基础趋于完备，人的素质和创新能力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投资于人上升为矛盾主要方面；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高质量的人重新定义和塑造“物”，形成“物为人用、人驭于物”的良性循环。这一演进规律表明，“紧密结合”不是固定比例，而是动态平衡。

第四，人的全面发展是二者结合的根本旨归。马克思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视为理想社会的标志。无论是投资于物还是投资于人，最终都要指向人的解放和能力的提升。工具理性的扩张一旦脱离价值理性的规约，就会导致“物的世界增值与人的世界贬值”的异化，只有坚持“人重于物”，投资实践才能回归“人本导向”。

(三) 理论拓展：当代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分析

唯物史观对“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关系的分析，不仅适用于工业化时代的考察，在数字经济与

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生产生活的当下，更获得了新的理论解释力与现实紧迫性。

其一，数字技术重塑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形式与边界。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算法与智能平台成为新型劳动资料，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不再局限于对自然物的加工改造，而是扩展为对信息、数据与符号的生产与重构。“投资于物”的内涵已从传统的厂房、机器设备扩展至数据中心、算力基础设施与算法平台。与此同时，“投资于人”也面临着从传统技能培训向数字素养、算法思维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培育的升级。

其二，人工智能对“投资于人”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马克思将人的“类特性”归结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工智能作为“类人”存在物，在替代人类重复性劳动的同时，也倒逼人类发展更高阶的认知能力、复杂情感交互能力与价值判断能力。“投资于人”不仅要提升人的技术适配能力，更要培育人的批判性思维、伦理判断力与创新创造能力，使人能够在技术迭代中始终保有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规约。由此，人才能够在人机协同中保持主体性地位，成为技术的驾驭者而非被技术支配的客体。

其三，防止数字技术的异化是二者“紧密结合”的现实落脚点。当人工智能学习模型将人类思维活动解构为概率分布的参数优化时，“劳动异化便从物质生产领域拓展至‘类本质对象化’领域”。当人在数字平台上的劳动被转化为可计算、可优化、可资本化的数据时，人的主体性就会面临着被算法遮蔽的风险。这意味着，如果“投资于物”脱离“投资于人”的价值规约，数字技术就可能由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产物，异化为支配人的外在力量。防止这种异化，“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就要实现更高层次的紧密结合，物质投资必须服务于人的主体性能力的培育，而非单纯追求技术效率的最大化。唯有如此，数字技术才能真正成为“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力量”。

4. 实践逻辑：二者紧密结合的现实路径

在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基础上，实践逻辑要回答“如何推进”。当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现实中仍面临“重物轻人”的认知偏差、“以物为先”的投资惯性、“人物双投”的协同短板以及制度保障缺位等挑战。推进二者从“应然结合”走向“实然结合”，需要在系统观念指导下，从价值导向、资源配置、机制创新等多维度协同发力。

（一）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多重辩证关系

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和方法论。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人类社会，把社会看做一个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首先要处理好四对关系。一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坚持生产性投资与普惠性投资并重，避免“只讲效率不讲公平”或“只讲公平不讲效率”的极端。二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在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稳定增长、创造就业的同时，保持对教育、科技、人才的战略性投入力度，防止因追求短期绩效而压缩长期人力资本积累。三是统筹好局部与整体，东部地区要发挥创新高地的优势，中西部地区则优先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为全国劳动力再生产奠定良好基础。四是兼顾内部自主与外部开放，在自主创新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科技合作，通过跨国技术转移和知识双向共享，缩小与发达国家创新能力差距。

（二）以“投资于人”引领“投资于物”的方向与质量

以人为本，“投资于人”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政策，更是新发展观的生动实践形式。在物质资本已经具备相当规模的当今社会，投资于物的方向和质量，越来越取决于人的需求升级和能力跃升。一方面，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倒逼物质投资向民生领域倾斜。另一方面，高素质劳动者是先进设备发挥效能的关键。当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的人才缺口较大，出现“有设备无算子”的资源错配现象。必须加强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推行“产业技术标准与教育课程同步更新”机制，使物质资本投入与人力资本供给在结构上高度匹配。

(三) 以“投资于物”夯实“投资于人”的物质平台

离开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对人的投资只能是空中楼阁。当下“投资于物”需要聚焦两个重点：一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5G网络、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为远程教育、在线医疗、职业技能培训提供了普惠化的技术载体打破了地理屏障限制，让优质教育、医疗资源“飞入寻常百姓家”。二是绿色转型投资。清洁能源、生态修复、污染治理等领域的投入，本质上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空气、水、土壤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人的健康资本，投资于自然就是投资于人本身。同时，绿色技能的培训、绿色岗位的创造，也离不开对绿色技术和绿色产业的投资。

(四) 完善制度保障，构建“物与人”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

制度是把政策理念落到实处的核心保障。当前，“投资于物”已经有了从规划审批、税收优惠到专项债的完整制度链条；而投资于人大多还在依赖部门专项政策，缺乏顶层统筹和刚性约束。为此，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来补上这个短板。一是优化财政金融资源配置。逐步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改变“以物为先”的惯性；创新金融工具，引导社会资本尽可能多地流向民生领域。二是建立全周期评估与反馈机制。将人的发展指标纳入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绩效评价体系，以人民满意度为最终评判标准，避免“只问投入、不问成效”。三是推动区域协调与城乡融合。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服务制度，让教育、医疗、培训等公共投资“跟着人走”；鼓励东部创新人才向中西部流动，激活乡村和内地的内生发展动力。

5. 结语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提出，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见物不见人”的资本逻辑([5], pp. 15-25)，也超越了传统发展中“先增长后分配”“重物质轻精神”的片面思维。这一伟大命题始终从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发展动力转换与“人-物”关系重构中生长出来的必然结论，二者在手段与目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中不可分割。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们要立足于系统观念，统筹多重关系，把“投资于物”的基础支撑和“投资于人”核心驱动有机统一起来，并通过制度创新构建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实现“物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辩证统一发展。我们要立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理论，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大限度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民生福祉与经济良性循环，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双向奔赴，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与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002.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70.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62+531.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91.
- [5] 祝林林.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唯物史观意蕴[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43(3): 15-25.